



西北师大社科文库

西北地区 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研究

张永丽 耿小娟 著



人民出版社

西北地区 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研究

张永丽 耿小娟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胡欣欣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地区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研究 / 张永丽，耿小娟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 - 7 - 01 - 018517 - 0

I. ①西… II. ①张… ②耿… III. ①贫困问题—研究—西北地区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6629 号

西北地区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研究

XIBEI DIQU FANPINKUN ZHANLÜE YU ZHENGCE YANJIU

张永丽 耿小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8517 - 0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西北师范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地区十四所大学之一，也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重点支持的高校。学校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荟萃了一批著名学者，如教育学家李蒸、李建勋、李秉德、南国农等，中国语言文学专家赵荫棠、徐褐夫、尤炳圻、郭晋稀、彭铎等，历史学家黄文弼、顾颉刚、阎文儒、金宝祥、金少英等，心理学家胡国钰、章仲子、郭士豪、沈庆华等，法学家萨师炯、吴文瀚等，外国语言文学专家李庭芴、黄席群、刘维周等，著名艺术家吕斯百、常书鸿、洪毅然、黄胄等，著名体育教育理论家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等，都曾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讲学，辛勤耕耘，为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厚植西部人文传统，传承华夏历史文脉，把人文社科研究的真学问、大文章写在了祖国西北的大地上，也激励时贤后学秉承他们高尚的人格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践行“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和重要节点。作为甘肃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西北师范大学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其哲学社会发展定位与目标的独特性，那就是根植西北，立足传统，站在学科前沿，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需要，大力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地、人才培养重镇、政策咨询决策智库的重大作用，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文库》的编辑与出版，就是希望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中，以西北师大声音，展西部文化气派！这既是对西北师大百

年人文传统的承继与发扬，也是对学校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作为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国家与省域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标志性成果，本文库的编辑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立足基础性与前沿性。选题围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侧重学科基础研究，引领学术前沿探索。

二是彰显地域性与民族性。选题突出甘肃与西北地区的地域特色，突出多民族融合的民族特色。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库的出版，不仅要让世界知道“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西部”，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西部”“理论中的中国西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西部”。

三是秉持创新性与时代性。文库涵盖人文社科多个学术领域与研究方向，不拘泥体例的统一，但均以时代为底色、创新为基准，或能“揭示一条规律”，或能“提出一种学说”，或能“阐明一个道理”，或能“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创新过程中，致力国际视野和本土智慧水乳交融，追求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

明道尚德，推崇新声；崇尚学术，追求卓越！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真正发挥“名片”效应和“引领”作用，在集中展示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整体水平的同时，引领助推学校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迈向新台阶、产出新成果、形成新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文库》编纂委员会

2017年9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社会转型、人口转变背景下的农村贫困性质及特征转变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结构转型与农村减贫	2
三、贫困性质转变	9
四、贫困特征变化	17
五、结语	20
第二章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2
一、问题的提出	22
二、研究综述	23
三、多维贫困的测度和分析	26
四、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5
五、结论及建议	40
第三章 农户市场参与程度及其对贫困的影响	43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43
二、数据说明与样本概况	46
三、样本农户市场参与程度的测度	48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54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第四章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64
一、问题的提出	64

二、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66
三、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型	68
四、实证分析	75
五、结论与政策意义	82
第五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84
一、引言	84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86
三、模型说明及变量选取	91
四、实证结果分析	95
五、结论	98
第六章 教育对贫困的影响	100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文献综述	100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101
三、实证分析	104
四、结论与启示	110
第七章 健康对贫困的影响	113
一、问题的提出	113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115
三、实证分析	119
四、结论及建议	125
第八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	127
一、问题的提出	127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28
三、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	131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135
五、讨论与建议	141

第九章 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对减贫的影响	143
一、问题的提出	143
二、研究方法	145
三、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148
四、实证分析	153
五、结论和启示	157
第十章 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研究	160
一、问题的提出	160
二、国际反贫困政策实践与经验	160
三、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75
四、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	182
第十一章 西部地区贫困特点与政策框架	190
一、问题的提出	190
二、甘肃省脱贫攻坚的“一揽子”政策	191
三、样本村基本情况	192
四、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195
五、致贫的主要原因	200
六、甘肃省贫困特点和性质的定位	204
七、对甘肃省精准脱贫措施的建议	206
第十二章 教育致贫悖论解析及相关政策	212
一、问题的提出	212
二、样本农户家庭收支及教育状况	213
三、实证分析	218
四、“教育致贫”悖论的解析及原因分析	223
五、政策建议	227
第十三章 健康扶贫政策及建议	230
一、问题的提出	230
二、样本农户家庭特征及健康状况	231

三、健康不良人口及家庭基本特征	234
四、相关政策及其效果评价	240
五、政策建议	246
第十四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扶贫政策建议	249
一、问题的提出	249
二、甘肃贫困地区农户家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现状	250
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	255
四、相关政策建议	261
第十五章 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的扶贫政策研究	263
一、问题的提出	263
二、样本村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	264
三、样本农户整体人口状况	265
四、甘肃省精准扶贫政策评价	271
五、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扶贫开发的相关政策	274
第十六章 民族地区贫困的特征及相关政策	278
一、问题的提出	278
二、青海省贫困状况	279
三、青海省贫困特征	282
四、青海省农牧民致贫原因	284
五、青海省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287
参考资料	291

第一章 经济社会转型、人口转变背景下的农村贫困性质及特征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深化，我国已有 7 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① 农村贫困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93 年的 8.7% 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2.8%，按照 2015 年 2800 元的贫困标准，全国有 7014 万贫困人口，2016 年成功减贫 1240 万人，预计 2017 年将再减贫 1000 万人。^② 伴随着这一进程，我国农村贫困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以绝对贫困、生存贫困、物质贫困、收入贫困为主向以相对贫困、发展贫困、精神贫困、多维贫困为主转变，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诸如致贫原因复杂化、贫困人口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新的贫困群体不断涌现、贫困代际传递明显等。深刻认识这一变化对“十三五”时期的扶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十三五”时期是实现 2020 年国家发展目标的一个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定性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

① 资料来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15 年报告》。

② 我国贫困标准变化历史：1978—2008 年实行的是绝对贫困标准，2000—2010 实行的是最低收入标准，2011 提高贫困标准到 2300 元，2015 年再次提标至 2800 元。随着贫困线的提高，更多的贫困人口被识别出来。

小康社会。”准确把握贫困特征及性质的转变，将有助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实施和政策落实，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结构转型与农村减贫

（一）经济转型与农村减贫

1. 经济增长与农村减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3650.2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636138.7 亿元，年均增速为 9.72% 左右，同期人均 GDP 也从 382 元增加到 46629 元，增长了近 122 倍，年均增速为 8.65%。^①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有力地助推了国家工业化、城市（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农村人口的收入及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为农村减贫做出了突出贡献。从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看，1978—2014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数由 133.6 元增长至 9892.0 元，增长了 74 倍。从收入结构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由 1953 年的 73.62% 下降到 2014 年的 37.33%；而工资性收入则持续上升，由 1953 年的 21.10% 上升到 2014 年的 42.66%；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年增加，2014 年达到 20.01%，其中转移性收入占比达到 17.69%。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 1978 年的 116.1 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8382.6 元，恩格尔系数由 1978 年的 67.7% 下降到 2014 年的 33.57%，用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也明显增加，农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普及率逐年提高，每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移动电话、摩托车数量分别达到 115.6 台、74.8 台、77.6 台、215 部、67.6 辆，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改变普遍贫困的农村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经济增长促使农业得到极大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和非

^① 文中使用的经济增长、收入、消费等宏观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收入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用于农村的公共服务和扶贫支出不断增多，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力度加大，对缓解贫困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从经济增长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上看，1981—2001年经济增长对降低贫困发生率效果最为显著，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为 -2.7 ，即经济增长（居民的平均收入）每增加 1% ，贫困发生率就下降 2.7% （Ravallion 和 Chen, 2007）；2000—2008年，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为 -1.09 ，弹性绝对值低于前一阶段，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在下降。同时，从不同产业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来看，第一产业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绝对值最大为 3.44 ，第二、三产业分别为 1.82 和 0.81 （李小云等，2010），第一产业对农村贫困减缓作用最大（汪三贵，2008）。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因市场竞争、制度偏向等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阻碍了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发挥。由于长期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低于高收入群体，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作用不断下降（罗楚亮，2012），而且成为导致农村相对贫困不断严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五”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以经济增长达到显著减贫的策略将会受到挑战，需要转向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为主导的新策略，同时，需要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对农村减贫的重要作用。

2. 经济结构转变与农村减贫

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产值结构上，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 27.9% 、 47.6% 和 24.5% 转变为2014年的 9.2% 、 42.7% 和 48.1% ，其中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比重迅速上升。在就业结构上，农业就业人数迅速减少，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由1978年的 70.5% 、 17.3% 和 12.2% ，转变为2014年的 29.5% 、 29.9% 和 40.6% ；且城乡就业结构中，城、乡就业比例从1978年的 $23.7:76.3$ 逐渐变化到2014年的 $50.9:49.1$ 。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转移，同时就业结构、特别是城乡就业结构的变化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起

到了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不仅对经济规模产生直接影响,且可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影响其产出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发挥其减贫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主要是以使用廉价劳动力为特点的劳动密集外向型经济发展,其主要动力是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开创了能够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就业的工业实体,以及因工业、人口集聚而产生的第三产业就业。经济结构转型对农村的减贫效应最直接表现就是非国有经济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已达2.7亿人,其中1.62亿在城市非农部门就业,这极大改变了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严重、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缓解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人地矛盾,使得农村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持续增加,农业经营收入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而言,非农就业已经成为农民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选择,是农户脱贫的重要手段。据我们多次的社会调查资料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中有超过40%从事非农产业,农户收入构成中约60%以上为务工收入,且有“输出一人、脱贫一家”的功效。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人口红利渐次削减、用工价格不断上升、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难以为继或外迁,国家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性减速”的艰难调整阶段,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成为必然,而与之相适应的是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这一进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些低端制造业被淘汰、就业岗位减少,这使得部分农村人口依赖外出务工脱贫的效应受到限制。

(二) 社会转型与农村减贫

1. 城乡社会结构转变与农村减贫

长期固化的二元制度是导致中国农村长期普遍贫困的根源。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随后因二元制度松动发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成为极大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首推力。20世纪90年代,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积累和恶化,国家开始真正从全局正视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弊端,着手全面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之后所进行的诸如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放松人口流动限制、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等政策措

施,再次使农村经济发展获得活力。同时随着非农产业发展及带动非农就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发展,截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4.77%,使得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城镇化不仅在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在挖掘劳动力转移及“人口红利”潜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都有利于消除贫困。

城镇化的减贫效应内嵌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城镇化可通过改善生产要素配置和空间集聚的外部性来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状况。城镇化对于贫困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转移、空间集聚和经济联系。在人口转移方面,城镇化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农村人口的减少,通过乡城转移,一部分有能力有条件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务工,特别是一些地处地理环境较差、自然灾害频繁的偏远山区的农村人口,通过务工所得贴补家用,实现基本生存能力的提升,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甚至一些人长期定居城镇、实现持久脱贫与发展;在空间集聚方面,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重新流动和分配、最终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和外部性红利,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促进贫困地区脱贫;在经济联系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带来全体人口平均收入、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且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转移人口的消费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进而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从目前来看,我国城镇化的空间还很大,城镇化依然是支持经济增长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而如何继续发挥城镇化在减贫中的重要作用,应是当前及今后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还应充分关注城镇化所引致的我国贫困状况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一是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化的问题,如大量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工作于城市,但由于难以实现市民化,其中的贫困者实际已转化为城市贫困问题。二是因劳动力流动而导致的农村特殊贫困问题,如“三留”人员的贫困问题等。

2. 社会事业发展与农村减贫

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既是农村贫困的重要表现,也是农村贫困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可以促

进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具备一定知识的劳动力,有利于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及实现整体的进一步发展。教育的减贫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来实现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提升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层次越高的教育程度其收入效应越明显,受教育年限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63。同样,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其陷入贫困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农村,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健康状况欠佳时整个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很大,在目前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产物,既是人文关怀更是国家责任,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其对社会中发生的绝对贫困应具有底线“兜底”的重要作用。

多年来,随着国家公共服务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得以长足发展。首先,在农村教育方面,通过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显著提升,如2010年末农村家庭平均每100个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24.4人,比2000年下降了7.8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69.8人,比2000年增加了10.1人。^①同时大力推进教育减负和教育扶贫,如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实行“生源地贷款”等政策,有效减轻了农村人口的教育负担、降低了因学致贫的贫困发生率。其次,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和因病致贫的状况大幅改善。2010年末,全国乡镇卫生院床位数达99.4万张,比2000年增长了35.3%;至“十二五”末,绝大多数的贫困村建起了村卫生室。特别是2003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率已达96.5%,有效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医疗费用支出,极大缓解了农村因病致贫的状况。再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不断完善,2010年末,全国农村低保户覆盖平均水平达5%,扶贫重点县为9.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低保户户均领取低保金达到1163元,参加新农保的人口达

^①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2011》,其中2010年末农村家庭平均每100个劳动力中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别有52.4人、12.1人、2.9人、2.4人。

到42%。

尽管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受历史欠账、经济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城乡社会发展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特别是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保扶贫方面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教育方面,存在着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普遍低下的问题,农村学校因适学人口减少撤并导致的部分农村子女上学难问题,农村幼儿教育亟待发展且师资急缺的问题,随迁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等;在医疗卫生方面,虽然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极大缓解,但看病难、不方便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绝大多贫困村建起了村卫生室,但有资质的乡村医生十分缺乏,乡镇医疗系统的诊疗水平亟待提高;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低保过于“广覆盖”、水平低,以及“低保户轮换当”“低保依赖”等问题。农村社会救助范围太窄(目前主要是大病救助),对农户因其他突发性因素导致的贫困救助不力。更需特别关注的是,在目前贫困人口中因学、因病致贫、返贫的比例仍然较高,解决问题应是教育、卫生扶贫的重点。

(三) 人口转变与农村减贫

为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资源、就业、贫困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压力,我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10‰以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控制了人口数量,减缓了人口、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另一方面,直接干预了家庭生育行为,提高了家庭生育的机会成本,迫使家庭重视子女质量,对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素质有重要作用。因而,计划生育被认为是降低人口膨胀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使得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人口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不断减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7亿,占总人口的10.06%,二者比例皆大于国际通常认为的10%和7%的比例,意味着我国已成为人口大国中老龄化最为严峻的国家。从劳动力年龄结构看,在20世纪末中国劳动力供给达到高峰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其老龄化会

加剧。

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对农村发展及脱贫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在农村人口及劳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的趋势下，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少儿人口比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总人口抚养负担逐年增加。据中国老龄化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问题远重于城镇，表现为农村老年人口多、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程度严重、老人收入低等特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全国水平且呈下降趋势，农村劳动力内部老化严重，且劳动力出现断层、供给不稳定。农村少儿人口比例和少儿抚养比出现下降，“少子化”现象初现端倪。其次，农村家庭户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传统功能部分丧失，一些年轻男性婚姻困难。据我们多次的社会调查资料显示，2007年农村家庭户均人口为5.11人，随后逐渐减少，2013年为户均人口4.42人。2010年调查数据表明：在已婚家庭中，夫妻共同外出的比例为40%，而60%的家庭只有男性外出，女性则留守家中；在已婚外出家庭中，带孩子一起出去的只有6.03%，大部分孩子留在农村，外出家庭中由老人照顾孩子的比例为31.93%。这些数据表明：伴随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结构不完整，传统家庭功能弱化，特别是农村养老面临危机。同时，由于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特别是因农村年轻未婚女性劳动力外出寻求发展机会，致使一些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大龄男性人口的婚姻面临困难，而这些人随着年龄增加往往会成为农村新的贫困者、甚至到年老时成为五保户。再次，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女性化”呈不断加重趋势。我们2013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农业劳动力中，年龄在15—24岁的占比仅0.5%，25—34岁的占比为5.65%，40—49岁的占比为54.24%，50—54岁的占比为14.05%，55—60岁的占比为14.7%，由此可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中，年轻力壮的（35岁以下）很少，“80、90后”已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主要以40—54岁（占65%）人口为主，且随时间推移农业劳动力的老化还将不断加重。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男女比例大致为4:6，且女性比例还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表明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还将延续。

综上，目前农村人口及其结构、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及其结构变化趋势